

Book Review

McLaren, Peter & Farahmandpur, Ramin (2005). Teaching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Critical Pedagog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xiv+299 pp ISBN 0-7425-1039-5 (cloth); 0-7425-1040-9 (pbk)

Reviewed by

Junrui Chang^[1] and Changyong Yang^[2]

[1] Junrui Chang, Ph.D. candidate in the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 Ethnic and Minority Studies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lecturer in College of Edu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 *Correspondence:* Changyong Yang, Ph.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e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 Ethnic and Minority Studies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China, 400715, yangchangyong58 @126.com.

常君睿，西南师范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 通讯作者：杨昌勇，西南师范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教育社会学教授，中国重庆，400715，yangchangyong58 @126.com。

书 评

彼得·麦克拉伦、拉明·法拉曼普尔（2005）：

《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教学：一种批判教育学》

马里兰，兰哈姆：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

评论人：常君睿 杨昌勇

解读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批判教育学

我们有四个理由同意为这本书撰写书评。首先，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批判教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是这个领域众多杰出学者之一。1999年，本文作者之一的杨昌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当代西方“新”教育社会学进展评析》中专门研究过批判教育学。该论文现以《新教育社会学：连续与断裂的学术历程》为书名在中国出版（杨昌勇，2004）。第二，作为伊利诺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的访问教授，杨昌勇的研究课题是《教育社会学：美国的一种后现代实践及其理论》，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Ramin Farahmandpur）的著作《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教学：一种批判教育学》（2005）由此落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第三，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常君睿正在尝试将批判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她对中国乡村学校艺术课程的研究。第四，作为中国的教育研究者，我们对彼得·麦克拉伦及其合作者拉明·法拉曼普尔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教育学方面的努力很感兴趣。我们很乐意接受并为这本新书写书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增强了世界的相互依赖和交流，同时也在不同国家、地区和种族之间及内部引发了严重冲突。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在这本书里，不仅对批判教育学——它力图唤起学习者的批判意识、努力向压迫人的社会环境进行挑战和变革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而且也对新全球化理论——它力图帮助那些有觉悟的人们努力为全球正义与世界和平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把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国家赞助的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了批判的革命教育学，为作为变革性知识分子的教师在公共学校、尤其是在教育学院中应当做些什么提出了建议。通过把全球化、帝国主义、恐怖主义和美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他们提醒教师和学生如何在教学和学习中维护自身的权利。此外，他们还提醒作为多数的、自觉的公民如何向政府施加民主压力。总的说来，他们以

恰切的方式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打开了批判教育学的新视角，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新领域。

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的这本书由九个篇章、导论、罗伯尔托·伯尔思 (Roberto Bahruth) 教授写的前言和朱哈·舒尔兰杜 (Juha Suoranta) 教授写的结语等组成。他们在回顾和修改近年来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此书，从批判教育学的视角，系统地组织了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思考和再思考。下面几点尤为重要。

1. 对美帝国主义核心特征的探讨

被压迫者教育学和批判教育学不仅仅是一种教学与教学方法的理论改革。它们是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教育理论与社会理论，在实践上锐意社会改革。近年来，批判教育学通过探讨美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而形成了一种国际视野，并试图发展一种实践哲学和一些行动策略。

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资本主义是社会和人类的最高形式，随着后帝国主义的到来，帝国紧随帝国主义之后，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的资本主义共存”时代，国家权力已经退化，或者说其角色已经极大地削弱了，相反，他们赞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阿布·曼内赫 (Abu-Manneh) 对新近新帝国主义的分析，相信“在推进美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计划中，国家继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通过两个紧密相联的过程起作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 (p. 3)。在这本书中，全球化是当作批判帝国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来使用的。作者们指出了美帝国主义的不同表现，从冷战 (里根政府) 到伊拉克战争 (布什政府)，它们维护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和统治。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使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无竞争对手的帝国势力，这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一般而言，新右派持有一种追求地方分权、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其结果是那些物质生产的控制者也控制了精神生产，它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民主，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上的法西斯主义。的确是这样，在国际竞争中，政治民主在粗暴和血腥的军事压力下萎缩了，它还常常使用“人道主义者”的借口，但有时则是在明显的谎言掩盖下进行的。因此作者们声称：

如果我们对自己当下所见证的、在布什统治下作为一种低调的法西斯主义的美国放弃变革的话，那么我们就玩忽职守了，事实上，这个时期也许正在更加有效地酝酿着法西斯主义 (p. 6)。

2. 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研究原则的反思

作者们明确表示他们探究了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并将这些主要特征置于一种特殊的问题背景之中，以便从逻辑上表述他们的学术、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观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研究原则在他们的研究中是明显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作为通常被接受的研究原则自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遵守这些研究原则不应该妨碍批判的科学家追求真理和社会正义、承担道德和伦理的责任。事实上，包括教育理论和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和研究都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都有其目的、责任和政治价值。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市场应当而且实际上就是教育及教育改革的资助者，私人利益应该在市场过程中得到回报。事实证明，是那些为数极少的富有者控制着公共与社会生活。在此情况下，有些教育家却害怕面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躲进了学术象牙塔。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却勇敢地面对着这种现实。

许多持有并非终身教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在大学课堂里通过教学开辟了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新阵地，但是，质疑、更不用说揭露帝国主义和教育之间关系，对他们来说，变得日益危险了（p. 7）。

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也对某些教育家们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从教育学问题中剥离出来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有些教师教育项目，没有成功地与学生进行有关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对话，而许多进步主义的教师教育项目，也常常忽视了文化、种族和性别压迫的阶级压迫根源。作者们充满激情地呼吁批判教育学应当唤起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意识，并进行富有成效的反思性实践。

3. 对新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

19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等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学术和政治氛围。从那以后，公众几乎不大关注马克思主义，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或退缩到“客观的”研究中去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历史的低潮，而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时代，美国则进入了一个新帝国主义阶段——“单极”霸权的时代。新帝国主义的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然而，现在依然有一些学者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再度引入教育，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是必要的、有成效的、也是有意义的。正如他们所说：“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交替时期，对资本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过，尤其是自从掀起金融和投机资本的全球攻势以来”（p. 15）。

作者们指出，一群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尽管为数不多，不仅对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规则、而且也对植根于身份认同政治学经常采用社会运动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案形

成了一股挑战力量。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者包括迈克·科尔 (Mike Cole)、戴夫·希尔 (Dave Hill)、托尼·格林 (Tony Green)、格伦·雷考茨基 (Glenn Rikowski)、安迪·格林 (Andy Green)、亨利·吉鲁 (Henry Giroux) 和彼得·麦克拉伦 (Peter McLaren) 等人。

作者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就像马克思当年通过对“血腥的、肮脏的”资本的分析来揭露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那样，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则通过对当前“非人道的”资本及这种资本的新形式——跨国集团的分析来揭露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认为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控制。他们说：

我们追随马克思（特别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断言：资本主义经济根深蒂固的矛盾存在于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于生产资料占有者和为了获取工资而被迫出卖劳动的工人之间。这些矛盾进一步反映在贫富之间悬殊的差距之中。

(p. 45)

正如列宁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来分析作为“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征那样，作者们则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新矛盾形式分析了新帝国主义——全球帝国主义或“全球化”——的特征。他们认为新帝国主义是“一种老式的军事和金融实践以及发达国家以市场规律强加于人类自身的新尝试的综合” (p. 40)。他们认为列宁的“写作是对迄今为止出现过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政治的最重要的分析” (p. 62)。

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死，尽管它似乎已经丧失了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在当前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批判中仅表现出微弱的生命力，然而它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对批判教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将起到强壮剂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无疑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外部的人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4. 对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批判

在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教育已经有了明显的影响。有些教育家——包括左派的和右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批判教育家、激进的教育家以及进步的教育家——都接受了后现代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教育领域变得时髦起来。但是，后现代教育学者又可划分为几种不同的方向，每一种方向都有各自的视角和立场 (Hill, D., etc, 2002)。

总体上看，就像作者们所注意到的，后现代理论在多种方面对教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如此，后现代理论有其严重的缺陷并且妨碍了教育家们的研究和实践。就像

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有许多后现代主义。作者们对后现代理论的批判就在于它们未能对资本主义进行有力的挑战。

后现代理论家们，不仅在解释文化表征与结构如何受资本主义的束缚方面可悲地玩忽职守，从最坏的一面而言，他们还常常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混为一谈，从最好的一面而言，他们又常常把福利国家的改革主义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丹麦、瑞典混为一谈。(p. 18)

后现代教育家们接受了市场经济而未能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他们茫然的眼神中，社会发展已经迷失了它的方向和可能性；他们的社会策略充斥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在立场上滑向了与新右派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相似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消费主义。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过时的教条而抛弃了，他们不能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社会分析和解释中的能力，他们也不能理解在当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为社会正义与世界和平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迫切地需要的是什么。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微观政治学，过高地估计了语言、话语和文化中的推论性斗争。相反，他们否认社会斗争，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阶级或群体能够进行任何有效的集体行动以变革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承认阶级、种族和性别间的相互联系，但是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是极为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看来，历史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追求他们的目的的具体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

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批判是重要的，因为早在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诸如去中心、解构等特征帮助了教育家们理解和批判既存社会，这使得后现代教育家们具备了一种类似于激进的教育家、批判教育家、进步主义教育家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那样的批判的和激进的特征。尽管如此，后现代教育理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上与新自由主义和新右派具有密切联系。作者们的批判把批判教育学从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分离出来了，阐述了一些用后现代理论和方法写作的进步教育家的差异和特征，这些教育家们包括斯坦利·阿罗诺维茨 (Stanley Aronowitz)、亨利·吉鲁 (Henry Giroux)、威廉·多尔 (William Doll)、乔·金奇洛 (Joe Kincheloe)、罗宾·帕克·厄舍 (Robin Parker Usher)、理查德·爱德华兹 (Richard Edwards)、安迪·哈格里夫斯 (Andy Hargreaves)、理查德·史密斯 (Richard Smith) 和 菲利普·韦克斯勒

(Philip Wexler) 等 (pp. 33-34) ,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的批判揭示了批判教育学与后现代教育理论之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上的不同。

5. 对马克思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自从形成之后就有进步意义, 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 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初意图已经被颠倒了, 这其中的缘由是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文化是深深地根植于它的物质基础的一种表意系统, 阶级、种族、性别中的压迫和认同等社会问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发生, 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中心的文化总是企图统治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复苏的新保守主义所附和的“世界新秩序”和“机会平等”的神话, 看来对世界大多数人民而言, 的确是一种空洞的承诺, 而对霸权主义者来说却是福音。

麦克拉伦和法拉曼普尔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多元文化主义, 它强调了在对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多元文化教育。在第四章《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资本全球化: 抵抗政治学的一些蕴涵》中, 他们论证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野蛮的财富过度积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工业国家、后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少数群体的经济剥削和文化剥削”(p. 99) 而得以生存, 并由此加深了道德和伦理上的颓废。由此, “我们不相信自由市场体制能够促进民主, 我们也不认为全球化与政治阴谋无关”(p. 101)。在对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的这种批判基础上, 作者们建构了一种作为批判的多元文化教育之基础的批判多元文化主义

我们相信, 为了有效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 我们必须首先在统一的多元民族/种族对抗政治学上定位、识别、审视和变革压迫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就要求使意识形态批判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
(p. 109)

在第五章, 题为《全球化、阶级和多元文化主义: 来自红色笔记的片断》, 麦克拉伦和法拉曼普尔对包括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了更加深刻而尖锐的批判, 以发展一种马克思多元文化主义或革命的多元文化主义。它“为被压迫者从自身的条件出发、用自己的方式来挑战统治的社会关系所产生和再生产的各种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而打开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空间”(p. 147)。只有通过这种途径, 人们才能推动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建设。

6. 对革命的教育学实践和教育实践的推进

教育学实践的主体是教育学者和学者型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学实践主要是指教育中的理论建构。我们可以简要地将教育学实践分为这样四类: 岗位性教育学实践、参与性

教育学实践、鼓动性教育学实践、关切性教育学实践。教育实践的主体是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他们将教育学理论作为一种理想来接受，并有意识地将其应用于日常的岗位性教育工作之中。从批判教育学的观点看，教育学实践和教育实践的主体都应当是变革性知识分子。

批判教育学如今有许多同义词，如革命的教育学、革命的批判教育学、批判的革命教育学、革命的工人阶级教育学、社会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和“违法的教育学”（*contraband pedagogy*）。这些同义词不仅显示了批判教育学的特征，而且也显示了它的理论建构、实践目的和倾向上的不同维度。作者们说：

我们认为，理论必须为实践服务，反之亦然，因为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由理论来回答，这一情况强化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无论怎样，教育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决不能相互贬低，这是因为它们共存于一种辩证的张力之中（p. 7-8）。

批判教育学的目的是要把人类及其劳动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教育学实践的实施来说，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批判的教育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重新确立为其教育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他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用来理解、批判社会压迫和社会剥削，而且也要反思批判教育学的起点和目的，以培育和推动新时代的社会行动。

我们相信，人不仅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也是环境和教育的创造者。教育一方面受社会的制约，另一方面又改变着社会。教育使人类生活保持连续，又赋予人变革的品质，它张扬着人向善的本能，同时又遏制人试恶的冲动。教育学实践的核心是“合理性”的建构。社会中不同“合理性”之间的竞争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教育现象，批判某种“合理性”和为某种“合理性”辩护既可能是社会实践也可能是教育学实践。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人的自我实现正是在教育、社会和人之间的辩证张力中推进的。是突变还是渐变，是前进还是倒退，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以及它与社会历史规律的符合程度。（杨昌勇，2004，p. 239）

对批判教育学来说，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培育和发展一种反对新帝国主义斗争的解放力量，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寻求有效的实践策略，一些批判教育家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Brandt, D., 1991），还有一些批判教育家们已经进行着可贵的实践（McLaren, P. 1998），那么这一著作又有什么新进展呢？通过阅读，你会找到答案的。

彼得·麦克拉伦和拉明·法拉曼普尔的这一著作，对国家的和国际的形势极其敏感，它对穷人、被剥夺者和被压迫者充满了同情，它的确是一本值得每个人认真细读的

书，而不仅仅只适合于那些涉及到教育和对教育感兴趣的人。这本书促使读者继续深入思考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Brandt, D. 1991. *To Change This House: Popular Education under Sandinistas*.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Hill, D., McLaren, P., Cole, M., and Rikowski, G., eds. 2002. *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al Theory*.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McLaren, P. 1998. *Life in Schools: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杨昌勇，2004：《新教育社会学：连续与断裂的学术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